《自然科学史研究》 第 44 卷 第 3 期（2025 年）：329—342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Vol. 44 No. 3(2025)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区农业科研工作中心转向探析

徐茂宇✉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武汉 430079）

摘 要 东北解放后，出于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全面恢复农业科研工作，明确以农作物为研究中心，取得诸多成果。在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过程中，东北农业部门提出技术要与群众相结合，改进技术应践行群众路线，农业科研机构要注意吸收群众经验进行科学分析与提高。此后，不论是群众中的丰产案例，还是“肇源经验”，均体现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可以通过帮助农民改进耕作与栽培技术来实现短期内的大幅增产。而同一时期苏联“米丘林学说”的广泛传播，更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持，促使东北区农业科研工作中心由农作物育种技术转向耕作与栽培技术。

关键词 东北区；农业科研；群众丰产经验；米丘林学说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25)03-0329-14

农业技术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手，作为最早解放的东北地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农业科研工作率先得到全面恢复。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区注重以改进农业技术来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在此过程中，农业科研工作中心的调整反映出东北农业部门对应用农业技术认识的变化。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近代以来的东北农业技术史研究多集中于日伪时期，较少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东北农业科研工作。现有成果就中共接收重建日伪遗留农业科研机构、推广某一农业技术及苏联对东北农业技术的援助等问题进行探讨[1-5]，其中，日本学者汤川真树江注意到苏联“米丘林学说”对东北农业科研工作的影响。[6] 但作为刚刚取得革命胜利并讲求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农业部门，是否仅因为苏联的理论就大幅调整农业科研工作，则值得推敲。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利用档案、报刊等史料，通过考察农业科研与生产实践

收稿日期：2024-02-29；**修回日期**：2024-06-06。
作者简介：徐茂宇，1994 年生，辽宁大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农业史、东北区域史，Email：1047250868@qq.com。

间的关联互动来探究东北区农业科研工作中心转向的前因后果，希望能对深化当代东北农业技术史研究有所裨益。

1 东北解放后农业科研工作中心的提出与实践

1948 年，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东北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10 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以下简称东北局)鉴于土地改革后，农村中耕畜、农具分散且不足的现状及东北农业经营非具备一定数量的耕畜、农具无法耕作的特点，适时将农业生产方针调整为“以精耕细作，提高产量为主，以奖励开荒，扩大耕地面积为辅”[7]，希望通过组织农民互助合作与提高农业技术来发展农业生产。11 月，东北全境解放，东北局作出“关于全东北解放的形势与任务决议”，明确指出：“为了巩固东北解放区，发挥东北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我们就有进一步改善东北人民生活的任务。而不发展东北经济，不发展东北的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则这一任务就无法完成”。[8] 同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农业会议，林枫主席将精耕细作、增加畜力与劳动力、改良农具归结为提高产量的三个条件，要求“每省要办好一个农事试验场，多数县要办好一个种子繁殖场”。[9] 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①(以下简称东北农业部)具体制定 1949 年“农业生产建设计划”，提出“为了完成增产任务，提高产量与质量，应广泛的提倡农业技术，改进耕作法，充分发挥现有的技术条件并能普遍利用而收效最大的办法，以期在现有技术水平上提高一步”，同时“为着进一步提高农业技术，长期打算，根据目前与将来的需要，根据可能的条件恢复与建立各种农业技术部门”。[10] 从而加快了战后东北各地农事试验场的恢复重建工作。

1949 年 2 月，东北农业部召开农事试验场场长会议，制定《关于建立各级农事试验场的方针》，提出“农业部在南北满建立两个中心试验场，每省建立一个中心试验场，而较大的县份建立与生产相结合的采种场或种子繁殖场，在统一方针计划下，分别地区，分别试验场性质，有重点的进行技术研究试验，以资解决农业生产当中的有重大作用的技术问题，以期能收到实际效果”。[11] 从而恢复运行了农业部直属的公主岭农事试验场②、辽阳棉作试验场、兴城园艺试验场及分属各省的黑龙江克山农事试验场、松江呼兰农事试验场、合江佳木斯农事试验场、吉林九站农事试验场、吉林龙井农事试验场、安东蛤蟆塘农事试验场、安东通化农事试验场、辽宁熊岳农事试验场、辽西锦州农事试验场、辽北虻牛哨农事试验场、嫩江齐齐哈尔农事试验场、安东五龙背蚕业试验场、安东凤城烟草试验场，初步构建起“部—省—县”三级农业科研体系，东北农

① 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正式成立于 1948 年 7 月，1949 年 9 月改为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1951 年 8 月再次更名为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1953 年 1 月更名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局，直至 1954 年 8 月撤销。文中以各时期实际使用名称为准。

② 1950 年 7 月更名为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农业科学研究所，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前身。

业科研工作得到全面恢复。会议鉴于东北解放未久，百废待兴，农业科研力量与物质基础尚较薄弱的实际，要求“农事试验场的试验工作应从实际出发，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与目前可能利用的技术条件进行研究试验工作，必须抓紧主要的，对提高农业生产作用大的，而且普遍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并求得逐渐的普及与提高”。[11]

在农业技术中，农作物品种的优劣直接关乎粮食生产的质与量，日本殖民东北期间，就改良、引进了不少适应东北地区自然气候条件的优良品种。对此，东北解放区1947 年的《农业生产报告》就提到，“现在要把伪满试验成功的东西收集起来，保存好，如不注意，再过几年就要绝种。对好的品种，各省可注意推广”。[12] 1949 年 2 月的农事试验场场长会议明确“试验场的业务方针，应以农作物为主，而每个地区又应以适宜于当地条件的几种主要农作物为中心”。[11] 会议通过的《关于各级农事试验场工作任务及业务计划的决议》，细化了各级、各地农事试验场的任务、业务中心与重点并分配各试验场本年应进行的主要试验项目。从内容上看，凡综合性试验场，只有部属公主岭农事试验场作为东北农业科研的中心机构被要求“在已有研究试验工作基础上，根据目前及今后的需要在可能内进行新的研究试验工作，以解决急需解决的农业技术问题”[13] 而进行多门类农业技术研究，各省级综合性试验场的主要任务则是对优良农作物品种、种畜的搜集、纯化、繁殖及对当地主要作物进行品种改良与栽培试验。以黑龙江克山农事试验场为例，其 1949 年应进行的 6 项主要试验项目中，直接与农作物相关的即达 4 项(良种繁殖、品种试验、纯系分离、栽培试验)。

围绕以农作物为中心，各试验场一方面配合东北农业部开展群众选种工作，获取更多试验材料，另一方面则利用已有农作物品种制定试验计划，开展品种观察、品种比较、纯系分离、杂交育种和栽培试验等研究工作。对此，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制定《对本年度普通作物试验之意见》加以指导，针对现有良种混杂退化与农业生产迫切需要大量优良品种的矛盾，明确各场应以“纯化”为重点，对“各省管内一切伪满时代之奖励品种皆加以搜集，斟酌各品种之普及县别，决定耕种面积”，提醒各场在“繁殖伪满时代非其他地方之奖励品种时，于今年推广前应依本年之正确试验成绩判定适应与否，但不确实判明成绩，单依农家所称为优良品种广作繁殖，大量推广，这是甚属危险的”，另对纯系分离育种法、杂交育种法及其他试验提出指导意见。[14] 此后，该场陆续制定出东北大豆、水稻的“优良品种鉴别要点”，东北大豆、小麦、水稻的“品种比较实施提要”，供各试验场参考。同时，为克服研究者“在比较和研究许多报告书和成绩书的时候，恒因其研究的对象作物调查标准的不一致，而引起很多困难”[15]，制定《大豆、小麦、水稻三主要农作物田间记载及室内考种标准》加以统一。上述举措有力推动了优良品种的纯化复壮与繁殖推广。

1949 年 7 月，东北农业部召开农业技术推广会议，对半年多来的农业科研工作进行总结。在改良作物品种方面，会议种子组确定了可即行推广的优良品种(见表 1)及推广地域，初步制定了农家选种方法，明确了今后的育种方向与下一步品种试验的材

料来源，并要求各试验场今后推广品种“在未行推广前，应将一切有关材料提交农业部，经技术工作者会上鉴定后，方行推广”。[16] 可见，东北农业部门是以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谨慎地从事农作物品种改良与推广工作。

表 1 1949 年农业技术推广会议确定即行推广良种表

大豆	满仓金、紫花四号
小麦	克华、克山有芒白秔(大青芒)、勇捷、农林三号
水稻	兴国、弥荣、国主、小田代五号、改良种(延吉农场向当地推广)、陆羽一三二号
苞米	所有“白鹤”种子集中安东蛤蟆塘推广，其他各地的优良品种可就地推广
谷子	九站农事试验场将“薄地租”种子提出 4 000 斤交蛤蟆塘推广

说明：高粱尚无适于推广的品种，各省可就各地良种加以试行推广；谷子良种“金大燕京八一号”与“黄沙子”暂作试验繁殖。表格根据文献[16]整理制成。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农业科研队伍得到加强，并不再满足于对既有优良品种的纯化繁殖，而是致力于培育新的、更为优良的作物品种。1950 年 1 月，第二届农业试验研究工作会议根据东北农林部“进一步的组织起来，改进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基本方针和南满着重扩大特产作物耕种面积，北满着重增产商品粮食，特别是大豆的要求[17]，将农作物研究工作方针确立为“继续检定伪满推广品种之适应地域；良种纯化及繁殖，以便迅速推广，解决农民实际问题；小麦、水稻、大豆、棉花等作物杂交后代之处理及优良系统之固定；开始小麦、水稻、大豆、棉花、洋麻、高粱等作物之杂交育种；搜集本地种及选种，以期增加育种材料”[18]，使东北农业科研机构开始偏重于育种工作。如《松江省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计划大纲》直接要求农事试验场工作重点放在育种上。[19] 1952 年，东北农业部已初步划定农业区划，分为以特产为主的南满地区，粮食为主的中满地区，水稻为主的东满地区，畜牧为主的西满地区，豆麦为主的北满地区，南部以特产为主、北部以畜牧为主的热河地区，共六大农业区。其下再分 2—4 个小区，计 20 个小区①，并确定了大豆、小麦、水稻优良品种在各农业小区的分布地区与适应地区。[20] 东北农作物良种推广工作得到进一步优化。

至 1953 年，东北农业科研机构在农作物品种推广与选育工作上取得一系列成绩。既有良种得到繁殖推广，以大豆为例，适合黑龙江省克山地区的“紫花四号”，推广面积达 10 万垧(公顷)以上；适合海伦地区的“西比瓦”已接近普及；适合松江省绝大部分地区以及黑龙江省南部和吉林省北部的“满仓金”，推广面积达 100 万垧，且具备品质好、含油量高、丰产稳产的特性，较一般农家品种增产 10%—20%。同时，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如在日伪遗留育种材料基础上，选育出“哈系 2370”、“哈系 2602”、“哈

① 南满地区分为四平粮产区、锦绥特产区、辽南特产区、安东特产区；中满地区分为东西丰粮产区、吉东粮产区、吉中粮产区；东满地区分为延边水稻产区、通化水稻产区、牡丹江水稻产区；西满地区分为龙江农牧区、洮南畜牧区、吉西畜牧区；北满地区分为滨江麦产区、合江麦产区、讷绥豆麦产区、黑河麦产区；热河地区分为热东特产区、热西农特区、热北畜牧区。([20]，15-17 页)

系 3197”、“哈系 2229”、“MM21-5-4”共 5 个小麦耐锈品种；适合吉林中北部地区的大豆品种“哈五号”；产量更高的粳稻品种“北海 1 号”与亚麻品种“公系 32 号”、“公系 57 号”、“公系 75 号”等优良品种。[21]

上述优良品种的育成与推广，虽然促进了东北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但培育新品种所需时间较长，且推广普及亦需要时间。另外，如若没有其他农业技术相配合，仅依靠农作物良种增产，效果势必有限，据中央农业部的经验，“引用良种可增产 10%—20%左右”[22]，与东北区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这埋下了东北农业科研工作中心由农作物育种技术转向耕作与栽培技术的伏笔。

2　从提出“改进农业技术的群众路线”到群众丰产案例的涌现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更是党在革命与建设中的制胜法宝，即便对专业性要求极高的科研工作亦强调要与群众相结合。东北解放区 1947 年《农业生产报告》提出：“改良技术必须走群众路线，主要的把农民现有的经验结合起来，加以科学提高，是农业技术发展的一条道路。”[12] 尽管该表述不够严谨，但党领导下的农业科研工作要践行群众路线则是无疑的。《关于建立各级农事试验场的方针》明确：“技术试验工作应有群众路线。我们试验目的在于为广大农民培养优良的品种、新的工具、新的栽培方法、适合本地的耕畜以及防治病害办法，以期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技术，把试验的成果交给群众，为群众所掌握。因此就必须吸收农民经验，总结群众生产经验并提高之。在技术方法上多采取群众可以办到而能接受的办法，使技术与群众相结合，克服技术人员保守观点、单纯技术观点和脱离现实的百废俱兴的观点。”[11] 1950 年 1 月，《东北日报》发表东北农林部秘书长张庆泰的署名文章《论改进农业技术的群众路线》，文章回答了“试验什么，为谁试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谁将起着决定作用？”三大问题，系统阐释了何为改进农业技术的群众路线，强调其核心在于“农业技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从群众提高，向群众推广”。[23] 概而言之，农业技术干部要重视群众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批判接受资产阶级农业科学，农业科研必须面向群众，着重于满足群众需要，技术成果要为群众接受与使用，从而提高生产力。

张庆泰的文章在第二届农业试验研究会议上得到广泛讨论，有同志提出：“苏联的试验场也是要搞几百种的试验的，我们多养了几种牲畜，多培育几种植物，就算是动植物大观园吗？土壤分析是农业科学上的重要课题，难道不应进行试验吗？试验场如不搜集多种多样的试验对象，还能有所成就吗？”[24] 东北农林部张克威副部长也指出“抓不住中心，五花八门大观园式的搞法还存在，脱离群众为试验而试验的单纯技术观点还未完全克服等”缺点。[25] 对此，张庆泰再度撰文《再论改进农业技术的群众路线》，文章从实际出发，答疑解惑，既反对“完全看不起群众的土东西，专门搞洋马、洋猪、

洋鸡、洋式饲养管理法等”的“右”的观点，又反对“只搞土东西、土办法，而完全拒绝搞洋东西、洋办法”的“左”的观点，指出“应研究如何把土气与洋气统一起来，如何把提高与推广统一起来”，要根据农民当前需要与试验场具体条件分出轻重缓急，致力于目前重要且必要的研究项目。[24] 由此推动了东北农业科研机构在工作中践行群众路线，并创造出典型经验。

夏锄铲蹚是当时农民感到最费工与最困难的生产环节，因此铲蹚机成为东北农具改良与推广的重点之一。铲蹚机类农具，1949 年即推广 13 种共 1 928 台，1950 年亦推广 13 种，数量增至 28 784 台，占当年推广改良农具总数 47 561 台的 60. 5%。([20]，128-130 页) 推广初衷在于提高农民铲蹚作业效率与质量，但在设计制造与推广过程中却发生了粗制滥造、部分农具质量低劣、具体技术指导不够、盲目推广等问题。如吉林省农林厅制造的铲蹚机类农具“高作除草培土犁”，1949 年原样子还能用，修改后则基本不能用，被农民称为“赔本除苗犁”，且推广数量高达 14 599 台。对此造成的不良影响，吉林省政府除责成省农林厅深刻检讨外，要求“不论贷出或未贷出的，原则上由农林厅收留，各地银行马上移交各市县旗农林科(农业科)接管，并造清册，办理移交手续，贷款由省府负责偿还银行。但银行自行购买或制造的部分，由银行负责收回处理”。[26] 另外，由于推广的铲蹚机种类较多，缺乏标准的构造与材料规格，且南北满土质不同，耕作法各异，各地推广前又未加认真试用，致使有的铲蹚机，南满嫌机身笨重、铧子宽，北满则嫌机身短、铧子窄，培不上土。为此，东北农林部提出要综合各种铲蹚机的优点做成一种，经实地试验确实好使后，再制造推广。

1950 年 8 月，东北农林部会同黑龙江省农林厅、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克山农事试验场、克山县农林科组成试验小组进行设计，由福民铁工厂负责制造样机，在克山、龙江、肇东等 8 个县市区村试验 23 次，中间做了 8 次修改。9 月，又到辽东、辽西二省调研，做出中型铲蹚机的样机。9 月底，召开农林部农具规格会议，结合实地试验情况初步确定了“综合号”铲蹚机的统一规格，并决定根据统一规格再造样机于各地试验。10 月中旬，农林部制造样机 60 台分发各省，派出 7 个小组分赴 5 省 12 县市进行试验 54 次，各地参加干部与农民 765 人，分别在重粘土、碱土、沙壤土等不同土质、不同庄稼茬口、不同铲蹚遍数情况下进行试验，且尤为注重组织农民亲自试用，座谈研究，各省也采取这一办法。后经统计，共在 53 个县市试验 227 次，参加的干部、农民 2 551 人，提出各类意见 121 件，终于在第二次农具规格会议上确定了“综合号”铲蹚机的大、中、小型标准规格。[27] 1951 年推广后，尽管还有个别小毛病有待完善，但农民普遍反映好用并积极要求使用。如海伦县十七区禄生村农民于清林说：“这个家伙研究的真妙，若调节好了，一天也不用动，一蹚到底，真解决问题，把曲麻菜根子都铲出来啦。”东丰县劳模会上，有劳模反映：“奖励劳模不用别的，就给一台综合号铲蹚机就行。”[28] “综合号”铲蹚机遂成为科学技术与群众相结合的典型案例，坚定了东北农业部门改进农业技术要走群众路线的信念。1951 年爱国主义丰产运动的展开，使东北农

业部门愈发关注群众经验在农业增产上的作用。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1951 年 2 月，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为了争取今年全国的丰收，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在目前全国抗美援朝的形势下，必须开展一个全国性的爱国生产运动(老区为爱国丰产运动)，以便更加提高全国农民的生产情绪，顺利地完成今年全国农业增产任务。”[29] 3 月，东北人民政府颁布《爱国主义农业丰产运动奖励办法》，“奖励组织起来参加劳动互助合作及所有劳动农民，积极地改进农业技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与扩大耕地面积，并提高农作物产品的质量”。[30] 同年底，根据《东北区一九五一年高额产量标准》，经农业部门现场实测和调查印证，各地确实涌现出一批丰产案例。在总结经验后，由东北农业部农产处汇总编成《一九五一年东北区农业高额产量经验汇编》供各地参考。如将这些丰产经验加以比较分析，则呈现出共通性、差异性与偶然性的特点。

所谓共通性，就是这些丰产案例均注重利用农业技术增产，如选用良种，播种前选种消毒，深耕细耙，适时播种，植株疏密得宜(多偏向密植)，根据土壤条件多施优质粪肥并适当追肥，勤铲勤蹚，随铲随蹚，注意防治作物病虫害，秋收时去杂去劣、单打单收，防止混杂。差异性则缘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如陶铁锁小麦丰产地的“大垅播种法”适合于碱土地带及低洼地，在播种期土壤干燥或播种后少雨条件下，可能使种子发芽不良，其他地区不能完全采用。[31] 而偶然性则体现为非人为条件下，或未经预先设计而偶然导致的提高产量因素，如倪长江大豆丰产地本年未受病虫害。[32] 又如秦宝昌大豆丰产地 1950 年施用的黄粪，当年没有充分腐熟，1951 年又上 20 车土粪，等于两茬粪供一茬作物利用，使作物得到充足的养分。[33]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个别经验没有科学依据，如刘登文用猪油拌种，后被证明没有作用。[34] 由于上述特点及各案例仅是在小面积土地上得到丰产，虽可作为经验供各地参考，却不适于大规模推广，但对东北农业部门产生了启发，他们认为，“各种作物的高产量均超过平均产量的一、两倍乃至三、四倍，较之低产量则相差更多。这些事实说明目前的一般产量并不高，而且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之下，已经有超出平均产量数倍的可能”。[35] 1952 年“肇源经验”的出现，使东北农业部门看到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通过改进耕作与栽培技术实现大面积增产的希望。

1952 年，爱国丰产运动继续开展，中共肇源县委却了解到很多小组增产计划基本是常年产量数字，有的甚至把丰年的实际产量降为常年产量，县委乃决定分头下乡，找群众研究增产问题。县委书记任国栋到七区四合屯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量垅底、数茬口、称穗头、算产量的办法，用事实打破农民“生产到顶”的保守思想。同时，将本地农民的耕作法与附近地区的高额产量经验进行对比分析，找出不足，研究改进耕作技术，提出使用良种，做好种子处理(选种消毒)并总结出“等距宽播，间苗保苗，分期追肥”的增产方法，于春耕开始时宣传推广。在全县播种结束后，开展技术评比，提高群众增产热情。针对夏锄阶段农民实行等距间苗时存在的惜苗、怕多费工钱的思想，

便组织群众到先进农民地里实地察看株距，还组织 3 000 多人到县示范农场参观，增加农民实行新的增产方法的决心。[36] 当年，肇源县在受灾情况下，全县 11 万垧耕地平均每垧产量仍达 3 500 斤，比去年增产 67%，其中完全采用新方法耕种的 9 000 多垧作物，产量更普遍比往年增加一倍到两倍。[37] 对此，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批示："肇源县的经验说明：东北农业生产中的潜在力极大，只要我们能够重视发现当地农民群众中的先进经验，根据农业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总结，然后予以推广，就可以使农业中的潜在力逐步发挥起来，从而大大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38] "肇源经验"因此于 1953 年开始普遍宣传，重点推广。

从提出"改进农业技术的群众路线"到各地丰产案例的涌现，再到"肇源经验"，均表明技术与群众相结合，科学吸收与总结群众丰产经验，帮助农民改进耕作与栽培技术，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这为东北农业科研工作中心转向提供了现实依据。

3 "米丘林学说"与中央农业技术考察团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全面学习苏联，具体到农业科研领域则体现为对苏联"米丘林(И. В. Мичурин)学说"的宣传与学习，尽管此时的"米丘林学说"掺杂着李森科(Т. Д. Лысенко)的许多观点，甚至有学者认为该学说是"李森科盗用米丘林的名义，提出的一整套与米丘林的理论没有多大联系的新的遗传学理论"。[39] 作为毗邻苏联的东北，在 1949 年 7 月的农业技术推广会议上，东北农业部魏震五副部长就提出："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不要死啃住旧的反动的孟德尔的法则，要根据米丘林的原理法则去批判旧原理、旧法则，建立新的技术工作，这样才能发展，才能进步。"[40] 东北农林部还将当年 11 月出版的《东北农业》第 8 期作为"米丘林学说"特辑介绍米丘林与李森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米丘林学说"虽然得到重视，但尚未如在苏联一样获得绝对统治地位。

1950 年，张庆泰在《论改进农业技术的群众路线》中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吸收外国的农业技术，特别是苏联的先进技术"，但"绝不能机械的搬用外国现成的农业科学，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农业科学必须批判的接受"。[23] 针对当年第二届农业试验研究会议讨论中出现的"部分同志感觉过去一切都是错的，弄得无所措手足，以后不知如何去搞工作"的偏向[25]，他在《再论改进农业技术的群众路线》中，以苏联都是平作，但东北未必所有土壤都适于平作为例，强调理论与实践应密切结合。可见，此时对"米丘林学说"的学习还是从实际出发，且不完全拒绝对西方孟德尔(G. J. Mendel)、摩尔根(T. H. Morgan)为代表建立的近代生物遗传学的吸收与利用。尽管"米丘林学说"的宣传声势很大，但东北农业科研工作者多沿用自己熟悉的西方理论与方法开展研究，如进行纯系育种、田间设计、生物统计等，对学习与应用"米丘林学说"缺乏信心。以辽东省熊岳农业试验场为例，该场在 1953 年的业务思想检查中总结道："米丘林的先进生

物科学在 1949 年即被介绍到我场，并引起所有技术干部的注意与兴趣，同时也有些人进行了一些嫁接与无性杂交的试验，但由于当年未看出显著变异就对米丘林伟大的生物学说开始怀疑，认为米丘林学说不是成方大全，因而感到失望。反而觉得日本资产阶级的学者讲日本大豆育种学解决问题。”[41] 前述种种，在后来被视为唯心论与机械唯物论在农业科学领域的体现。对此，张庆泰撰文指出：“他们毫无批判地背诵外国资产阶级的农业科学理论，而一切作物培育法，视为永恒不变的绝对法则，不许别人来触犯它。”[42] 文章要求农业科研工作者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与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础上，逐渐克服教条主义与旧的传统，创造新的传统。

“米丘林学说”作为苏联先进科学的代表，被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生物科学中的正确应用，在 1951 年冬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迅速取得了政治上的全面胜利，并逐步在整个生物科学领域得到广泛深入的推行。[43] 1952 年 6 月，《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文章评价道，“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科学上的根本革命。它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它的哲学基础，证明了生物发展的辩证过程。由于掌握了生物发展的规律，它把生物科学发展到了全新的、更高的阶段”，并对全国学习“米丘林学说”情况表示不满，指出，“米丘林生物科学介绍到中国来已经两三年了，我们不能使之仍然停留在介绍的阶段。如何使米丘林生物科学和中国农林、畜牧事业相结合……如何推广已获成效的农业技术等问题，都需要我们来解决”。[44] 文章号召发动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这对全面推行“米丘林学说”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1952 年 7 月，中央农业部杨显东副部长携农业部顾问、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植物栽培研究所禾谷类作物系主任伊万诺夫（А. П. Иванов），率中央农业技术考察团赴东北考察调研。在东北期间，伊万诺夫大力宣讲“米丘林学说”，坚持“生活条件的创造作用，认为生物的遗传性归根结底是由外界条件通过新陈代谢转化而来，根本否认有遗传内因的存在，而主张自体外获得遗传”。[45] 他在克山农业试验场的报告中阐释杂交与栽培技术间的关系，即米丘林认为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通过合理选择亲本来动摇杂交后代的遗传性，并预见其性状发展方向，通过改变外界条件使研究者需要的性状成为显性。李森科进一步发扬了这一学说，不用杂交，而用栽培方法使研究者需要的性状得到提升。[46] 反观摩尔根学派，则“坚持从生物的内部矛盾的运动变化来说明遗传变异，外界的生活条件被认为只能引起生物的表现型的变异，而这种表现型是不能直接遗传的，只有基因型或基因突变才能直接遗传”。[45] 因此，伊万诺夫在考察过程中特别注意栽培技术，在其多场报告中都强调，“好的栽培条件是育成新品种的主要条件。在好的栽培技术条件下，原来不好的品种也会得到改善；在低劣的条件下，就不能育成好品种，即使原来好品种，也会变坏，失去生产上的意义”，并以劳模举例论证，“劳模们用同样的品种获得了高额产量。他们改变了什么呢？为什么会比当地平均产量高出五倍、八倍、甚至十倍呢？我的看法：劳模们所以能获得高产量，主要由于他们改

善了栽培方法，改善了农业技术”。[47] 对于各试验场以育种为中心，且有的场仍以孟德尔与摩尔根的理论进行杂交育种工作，他大为不满，指出：“这两种科学在原则上是完全不同的，两者是不可调和的……好好地研究过米丘林的著作之后，再去看看孟德尔、摩尔根的反动学说，这样你就会把孟德尔、摩尔根的伪科学抛弃得干干净净。”([47]，104-105 页)

结合考察调研情况与伊万诺夫的报告与意见，杨显东副部长在东北农业部所作报告中指出，“目前国家农业生产的总方针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因素，除了大力发展组织起来及国家经济力量的扶助外，主要的是提高耕作技术”，[48] 强调“学习米丘林科学时，必须将旧的摩尔根一套彻底批判，抛弃干净，抱一面倒的立场，如果脚踏两只船，那么一定会掉下水去”，并要求东北农业科研机构“掌握米丘林科学，必须掌握其实质，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去灵活运用”。([48]，202 页)

在中央农业技术考察团结束全国性考察返回北京后，发表了《中央农业技术考察团考察报告》，指出：“今天劳动模范的产量超过一般产量的五倍至十倍以上，已经有力地指出了提高栽培技术、改良耕作方法是提高产量最切实有效的途径……虽然改良品种也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重要方法之一，但育成一个优良品种往往要花较长的时间，如果创造一套科学栽培技术，则可以迅速达到增产的效果。”[49] 报告还提出，“必须扭转过去只片面重视育种工作而不注意改进耕作栽培技术的错误倾向”，要求“必须根据各地具体条件，找出当地耕作技术栽培方法上主要存在的关键问题，深入地加以研究改进，特别是运用综合技术来克服旱涝病虫灾害，改良土壤结构增进地力的基本改进工作”。([49]，554 页)

尽管由李森科建构的“米丘林学说”并不完全科学，如我国生物学家李继侗晚年所言：“李森科自称为米丘林事业的继承人。如果说继承，那只能说李森科继承了米丘林第一阶段(风土驯化阶段)的观点，然而这不是继承而是倒退。”李继侗认为，“米丘林并没有将自己的观点和孟德尔、摩尔根的观点从根本上对立起来。米丘林在第三阶段(杂交阶段)十分重视杂交的作用……他将杂交作用归结为把不同亲本的性状，即把南方品种在味道、大小和色泽等方面性状和野生种的抗寒性结合起来，这同孟德尔关于基因分离组合的观点是并行不悖的。在他后期的文章中经常地使用因子或基因、因子型的概念”。[50] 但“米丘林学说”为东北农业科研工作中心转向提供了理论支持，且在中央农业部的要求下也必须转向。

4 余论：东北区农业科研工作中心转向及其影响

1953 年起，“一五”计划的实施对农业增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当年的东北区农业技术会议总结报告中，依据“米丘林学说”，提出：“耕作技术是培育优良品种的主要条

件，孤立地搞育种工作，育种万能的想法都是不对的”。明确“目前试验研究机关应该是以改进耕作技术的试验研究为中心任务，过去以育种工作为重点是不适当的”，同时在“肇源经验”基础上，提出“等距全苗，合理密植，深耕保墒，合理施肥”的基本要求来改进耕作与栽培技术，东北区农业科研工作中心实现转向。[51] 1954 年的东北区农业科学试验研究工作会议对这一转向作了更加全面的表述，即“农业科学试验研究工作必须坚决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把科学理论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集中力量解决增产技术的关键性问题，达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并通过改革技术促进农业合作化。其中心任务是在改进耕作技术基础上着重综合研究，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52] 可见，此时东北农业部门对耕作与栽培技术的定义，就是以“米丘林学说”为理论基础，能较快提高本地区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与质量的多种农业技术的综合应用。

对于东北农业科研工作中心转向带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积极影响在于，促使东北农业部门在技术科研与应用方面，由重点走向综合，突出整体技术观点，因地制宜地对多种不同农业技术进行综合应用。如《东北区一九五三年五种粮食作物的丰产技术试行纲要》的出台，帮助农民提高了生产技术，有利于农业增产。消极影响在于，单纯以“米丘林学说”为指导，过度强调总结农民的丰产经验，削弱了科研机构对农业基础科学的研究，如各农业试验场的杂交育种工作就一度减缩或中断[53]，黑龙江省的农业试验场出现了“开始注意场外调查，忽视场内工作的倾向”。[54]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转向虽对农业科研工作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但对农业生产则影响有限。1953 年，在受灾情况下，东北区取得了粮食总产量 1 859. 2 万吨，平均单位面积(垧)产量 1 245 公斤，略高于 1950 年(丰年)的成绩。[55]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以农业技术为重要抓手，有效促进了东北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其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东北区农业科研工作中心的转向，是中国自身经验、苏联农业科学理论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转向后，农业科研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在新中国成立未久、经济建设工作尚在摸索当中的背景下，亦不该过分苛责。随着党和政府对应用农业技术的认识不断提高，这些问题逐渐得到解决，这一转向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初衷应该得到肯定。

参　考　文　献

[1] 杨慧，衣保中. 建国初期苏联对我国东北地区农业技术援助的研究[J]. 农业考古，2010(4)：72-76.

[2] 山本晴彦. 満洲の農業試験研究史[M]. 東京：農林統計出版社，2013.

[3] 湯川真樹江. 中国東北地方における満州国の農業遺産接収過程と水稲品種の変遷——中国共産党による接収と再建を中心に[J]. 社会システム研究，2013(26)：29-47.

[4] 张建. 新中国建立初期东北地区新农具推广运动及实效分析[J]. 农业考古，2014(3)：139-145.

[5] 杨越. 1949—1952 年黑龙江地区新式农具推广工作研究[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1)：85-95.

[6] 湯川真樹江. 中華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におけるミチュ一リン理論の学習とその影響——東北農業科学研究所を中心に[J]. 農業史研究, 2020(54): 75-82.
[7]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今年农业生产的总结与明年农业生产任务的决议[N]. 东北日报, 1948-12-17(1).
[8] 东北局关于全东北解放的形势与任务决议(1948 年 11 月 23 日)[G]//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第 1 辑.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101.
[9] 林枫主席在农业会议上的讲话(1948 年 11 月 19 日)[G]//一九四九年东北农业生产总结汇编. 沈阳: 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计划处, 1950: 249.
[10] 东北解放区一九四九年农业生产建设计划[J]. 东北农业, 1949(创刊号): 10-15.
[11] 农业部关于建立各级农事试验场的方针[N]. 东北日报, 1949-03-09(1).
[12] 魏震五. 农业生产报告(1947 年 7 月 27 日)[G]//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第 1 辑.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459.
[13] 农业部农事试验场场长会议关于各级农事试验场工作任务及业务计划的决议[J]. 东北农业, 1949(2): 6-11.
[14] 永野义治. 对本年普通作物试验之意见[J]. 农试通讯, 1949(1): 8-11.
[15] 农业部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大豆、小麦、水稻三主要农作物田间记载及室内考种标准[J]. 农试通讯, 1949(2): 27-36.
[16] 改良作物品种种子组总结[J]. 东北农业, 1949(6): 10-18.
[17] 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 一九四九年农业生产总结及一九五〇年农业生产计划(纲要)(1950 年 1 月)[G]//一九四九年东北农业生产总结汇编. 沈阳: 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计划处, 1950: 66.
[18] 第二届农业试验研究会议作物组总结[J]. 农试通讯, 1950(12): 8-21.
[19] 松江省农林厅. 松江省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计划大纲[A]//1951. 哈尔滨: 黑龙江省档案馆, J026-001-00029-0012.
[20] 东北农业生产参考资料[R]//沈阳: 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 1952: 28-30.
[21] 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 建国初期东北区农业试验研究工作的主要成就(摘自《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档案》, 编者未注明成文时间)[G]//武衡. 东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 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 农业卷. 北京: 中国学术出版社, 1986: 91-94.
[22] 张林池.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讨论问题的综合报告(1951 年 11 月 25 日)[G]//编者不详. 一九五一年东北农业生产总结汇编. 沈阳: 东北农业出版社, 1952: 50.
[23] 张庆泰. 论改进农业技术的群众路线[N]. 东北日报, 1950-01-14(1).
[24] 张庆泰. 再论改进农业技术的群众路线[N]. 东北日报, 1950-03-09(2).
[25] 东北农业试验会议确定技术要与群众结合 着重繁殖改良品种[N]. 东北日报, 1950-02-09(2).
[26]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新农具的处理决定[A]//1950-10-11. 长春: 吉林省档案馆, 0002-1950-0072-0017.
[27] 张庆泰. 东北区一九五〇年新农具推广工作总结(1951 年 3 月 10 日)[G]//东北农业出版社. 一九五〇年东北农业生产总结汇编. 沈阳: 东北农业出版社, 1951: 110-111.
[28] 农林部农业处. 一九五一年春夏季新农具推广与旧农具供应情况[J]. 东北农业, 1951(30): 15-20.
[29] 农业工作会议决定开展爱国生产运动 争取今年全国丰收[N]. 人民日报, 1951-03-02(1).
[30] 东北人民政府. 开展爱国主义丰产运动(1951 年 3 月 12 日)[G]//东北农业出版社. 一九五〇年东北农业生产总结汇编. 沈阳: 东北农业出版社, 1951: 278.
[31] 东北农业部农产处, 黑龙江农业厅. 陶铁锁改良土壤创造小麦高额产量的调查报告(1951 年 12 月)[G]//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农产处. 一九五一年东北区农业高额产量经验汇编. 沈阳: 东北农业出版社, 1952: 98.
[32] 吉林农业厅. 倪长江紫花一号大豆高额产量介绍(1951 年 11 月)[G]//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农产处. 一九五一年东北区农业高额产量经验汇编. 沈阳: 东北农业出版社, 1952: 77.

[33] 松江农林厅. 秦宝昌满仓金大豆高额产量经验(1951 年 11 月)[G]//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农产处. 一九五一年东北区农业高额产量经验汇编. 沈阳：东北农业出版社，1952：75.
[34] 辽东农林厅. 刘登文苞米丰产经验介绍(1952 年 4 月)[G]//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农产处. 一九五一年东北区农业高额产量经验汇编. 沈阳：东北农业出版社，1952：150-151.
[35] 梁秋.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完成增产任务[J]. 东北农业，1952(35)：1-5.
[36] 任国栋. 肇源县农业增产运动的经验[N]. 东北日报，1952-10-18(2).
[37] 肇源近万垧地产量倍增 黑龙江省召开会议总结该县丰产经验[N]. 东北日报，1952-10-18(1).
[38] 高岗主席对肇源县增产经验总结的批示(1952 年 9 月)[G]//编者不详. 一九五二年东北农业生产总结汇编. 沈阳：东北农业出版社，1953：18.
[39] 郝志功，魏兴. 总结历史经验 发展自然辩证法——遗传学两派“争论”的历史回顾[J]. 青海社会科学，1983(4)：42-48.
[40] 魏震五. 改进农业技术加强推广工作[J]. 东北农业，1949(6)：5-7.
[41] 辽东省熊岳农业试验场业务思想检查总结[A]//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 辽东省熊岳农业试验场关于坚持米丘林学说检查水坝受害报告科室总结包工合同等文书. 1953. 营口：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档案室，2-17-13.
[42] 张庆泰. “实践论”与农业科学的改造[J]. 东北农业，1951(25)：16-19.
[43] 蒋世和. “米丘林学说”在中国(1949—1956)：苏联的影响[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1)：18-25.
[44] 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N]. 人民日报，1952-06-29(3).
[45] 叶峻. 坚持遗传学的辩证方向[J]. 重庆大学学报，1980(3)：108-111.
[46] 伊万诺夫. 米邱林杂交育种原则(1952 年 7 月 27 日)[R]//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 中央农业技术考察团对东北农业试验研究工作提供的意见. 沈阳：东北农业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44-48.
[47] 伊万诺夫. 对东北农业试验研究机构的观感和意见(1952 年 8 月 5 日)[R]//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 中央农业技术考察团对东北农业试验研究工作提供的意见. 沈阳：东北农业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88-89.
[48] 杨显东. 关于东北农业试验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1952 年 8 月 5 日)[R]//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 中央农业技术考察团对东北农业试验研究工作提供的意见. 沈阳：东北农业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191.
[49] 中央农业部农业技术考察团考察报告(1953 年 4 月)[G]//编者不详. 一九五二年东北农业生产总结汇编. 沈阳：东北农业出版社，1953：551.
[50] 葛明德. 李继侗晚年对米邱林和李森科的评论[J]. 中国科技史料，1980(1)：22-25.
[51] 张庆泰. 发挥东北农业生产潜力 迎接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N]. 东北日报，1953-02-05(2).
[52] 东北区农业科学试验研究工作今后的任务及一九五四年计划纲要(1954 年 2 月)[G]//东北区农业科学试验研究工作会议总结报告及资料汇编. 沈阳：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局，1954：31.
[53]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简史(初稿)[R]//公主岭：吉林省农业科学院，1987：29.
[54] 黑龙江省农业厅. 黑龙江省几年来试验研究工作总结(草稿)[A]//1954. 哈尔滨：黑龙江省档案馆，J101-001-00045-0007.
[55] 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 一年来农业生产成就很大[N]. 东北日报，1954-01-01(2).

Analysi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Work Centers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U Maoyu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in order to restore and develop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Northeast China fully resumed agricultural research work. This work focused on crops and achieved many results.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promotion, the Northeast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proposed that technology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masses, and improving technology should follow the mass line.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lso should absorb the experience of the masses for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Thereafter, both cases of high yields among the masses and the "Zhaoyuan (肇源) experience" reflected that, under the existing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it was possible to achieve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production in the short term by helping farmers improve their cultivation technique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s "Michurinism"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is, prompting the agricultural research work center in Northeast China to shift from crop breeding technology to cultivation techniques.

Keywords Northeast China; agricultural research; mass experience in high yields; Michurinism